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我与小树共成长”文化活动

文旅融合视域下红色研学 的多维创新实践

——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为例

戴仁广 蒋如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综合型旅游发展新业态不断释放需求,研学教育逐渐细化,呈现出“研学+”多元发展结构。作为全国中小學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的创新实践,持续提升红色研学产品的供给质量,拓展多元化研学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以革命精神为滋养,沉浸式感悟榜样力量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以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为教学目的,培育时代新人。一是重走历史旧址,触摸精神根脉。带领研学团队参观刘少奇故居、炭子冲学校等原址景点,以历史追溯者的身份,深切感受伟人成长成才、求学求知之路,告诫学生不忘来时路,不负今朝景。二是再现革命岁月,淬炼革命信仰。近年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发挥国防教育基地示范作用,布置场景展示高炮、坦克、履带式装甲车等一批退役武器装备,结合国防教育日开展特色宣讲活动,增强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在保持基本陈列独立性基础上,围绕馆藏文物特色,推出各类专题展览20余项,全方位呈现刘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与崇高风范。三是追寻革命记忆,激发报国志向。结合党的创新理论,系统性开发并讲述革命文物故事、特色党课、大思政课,把党史理论知识转化为红色“精神套餐”。《走出炭子冲》双时空情境研学剧,演绎青年刘少奇确立信仰的过程,学生通过沉浸式观看,激发内心共鸣,树立远大理想。

以生态景观为蓝本,全景式体验农耕文明

依托景区生态景观资源,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研学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生在躬耕劳作中感知刘少奇同志“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实现农耕文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衔接。一是深挖农耕知识,学习传统农艺精髓。通过炭子冲民俗文化展,系统展示传统农具器具,科普农耕技术,强化学生对传统技艺的认知与认同。二是活用生态资源,构建农耕体验场景。充分利用景区自然资源,连续4年组织“一起‘趣’插秧”“时令果蔬采摘”等农耕文化活动,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农耕文化载体,让学生在耕种劳作中形成对农业生产的基础认知。三是创新实践模式,延伸文化体验链条。围绕农时节气,将农耕实践与自然时序深度融合,建设农耕体验区、开展手工制作课堂等活动,突破季节性限制,形成全年可参与的农耕文化体验链。配套线上预约平台,实

现资源高效配置,推动景区成为“红色寻根+农耕传承”的双重教育基地。

以传统文化为元素,互动式增强游客体验

始终秉持文化为民、文化靠民、文化惠民的理念,立足湖湘文化特色,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性项目。一是抓住时代命题,构筑“修养”大讲堂。通过新媒体矩阵后台运营、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针对研学团队广泛开展调研,提供订单式文化菜单,满足学生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需求,践行立德树人教育使命。二是抓住时间节点,丰富文化服务。结合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佳节,以非遗文化体验、中小学“第二课堂”、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年均推出20余场次文化惠民活动。三是抓住游客需求,营造馆区氛围。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引进长沙市歌舞剧院“百村千场进万家”惠民演出。开展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实现文化交融,增强观众来博物馆参观的互动体验感,持续为游客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以资源联动为抓手,协同式实现发展共赢

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积极推动景区、校区、社区“三区”联动,构建跨领域、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协同网络,推动文化服务从“单点供给”向“全域共享”升级。一是深化馆校企共建,推动资源互助。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与省内外高校共建红色文化研究基地,开发沉浸式研学课程。同时,联合文博企业、研学机构协同深化多元合作,推动文创产品与研学课程开发提质、深度融合,培育跨界融合的“文化新质生产力”,实现资源互补与价值共创。二是激活社区参与,完善文旅生态链。通过“景区带社区”模式,为周边社区住户提供安置性商铺,进行市场化经营,打造“刘家老酒体验区”“民俗美食巷”等特色消费场景,提供更加丰富的交互式、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产品。丰富周边旅游产业业态,满足消费者社交、娱乐等多种需求,拓展旅旅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区域消费活力。三是构建长效合作机制,放大协同效应。联动相关红色场馆组建“全国刘少奇纪念地联盟”,构建“展览联展、课程联研、线路联通”的跨区域协作网络。深化株潭红色文旅走廊建设,共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通过参与全国首个红色文创联盟,联合34家文博单位制定行业标准,孵化特色文创产品60余款,形成文化IP叠加效应,使区域协同从资源整合向品牌共建、价值共创升级。

红色政权婚姻登记制度及实践变迁

——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博物馆馆藏边区婚姻证明说起

牛锦红 贾国涛

婚姻登记是男女结婚或离婚必须履行的法定手续,它是政府机关对男女双方建立或解除婚姻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进行监督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婚姻制度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所创立的婚姻登记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地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博物馆的中华法律文明馆展出了1000余件法典、法器文献,其中“红色记忆”板块,有两张特别耀眼的结婚证明原件,一张是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时期的“结婚证”,一张是1945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时期的“结婚证明书”。这两张结婚证明清晰地展现出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婚姻登记制度及实践的演变。

陕甘宁特区时期的“结婚证”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博物馆馆藏的陕甘宁特区“结婚证”是男女双方的结婚证件,两份证件均保存完整,可以充分反映陕甘宁特区时期结婚登记制度与实践情况。这张“结婚证”显示,颁证机关是“陕甘宁特区政府民政厅”,结婚人为金文淳(男)与李爱芳(女),年龄分别是24岁与22岁,籍贯均是吴旗,介绍人是曹师忽,婚姻登记员是谢文福,最后有落款时间,基本信息清楚。但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这张“结婚证”的首行文字中注明两人结婚是“应双方同意,遵照陕甘宁特区婚姻法,结为夫妇”。其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婚姻法”曾引起参观群众的不解,因为当时是没有《陕甘宁特区婚姻法》这一法律文件的,因此,有学者对此份证书提出质疑。事实上,这忽略了红色法制中婚姻观念、制度与实践的连续性。

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历史发展来看,193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苏区落幕并胜利结束。后来,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发展成陕甘宁苏区。1937年3月,陕甘宁苏区改称陕甘宁特区,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特区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更名虽从1937年5月开始,但直至1938年1月才最终施行。因此,1937年3月之前为“陕甘宁苏区”,1937年3月至1938年1月期间,陕甘宁“特区”与“边区”常常被混用。馆藏的结婚证书颁发机关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民政厅”,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即1937年5月,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的。

从红色法制的连续性来看,在1939年之前,并不存在《陕甘宁特区婚姻法》或《陕甘宁边区婚姻法》,但“陕甘宁特区”是

由“陕甘宁苏区”演变而来,“陕甘宁苏区”又来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鉴于陕甘宁根据地从1935年到1939年期间没有新的婚姻立法,并且“苏区”“特区”“边区”只是因为政治需要而作的更名,红色法制是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可以推定,“陕甘宁特区婚姻法”的说法并无错误,实质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代称,由于“苏区”向“特区”名称的更改,婚姻证上再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自然不合时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虽是1934年颁布实施的,但在实践中一直适用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出台为止。此外,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与‘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改聘金、聘礼及嫁装”。陕甘宁特区“婚姻证”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结婚证”的说法基本符合。

其次,证书上所显示的时间问题。男方婚姻证上的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五日”,女方婚姻证上的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其中一个人的结婚时间应有笔误,但可以基本肯定此婚姻证件颁发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另外,男女双方申请登记的时间也明显有问题,其中女方持证人的申请登记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男方持证人的申请登记时间为“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三日”,由于两人结婚证书落款是五月,推断登记时间应在五月份之前,因此,女方婚姻证上的“三月十五日”应为准确时间,男方证书上的申请登记时间应该是笔误。

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是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发端,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了结婚登记,第十二条规定了离婚登记,与根据地建立之前封建时期落后的婚姻观念及制度相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馆藏的陕甘宁特区“婚姻证”真实反映了1937年抗战前夕中国红色区域婚姻观念及婚姻登记制度的进步与实践的真实情况,虽然在时间上不够准确,但瑕不掩瑜。

晋冀鲁豫边区的“结婚证明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博物馆馆藏的晋冀鲁豫边区“结婚证明书”仅为一份文件,由于女方在证明书中排列在前,可以推

锚定文物事业发展 捍卫文物安全成果

“某公司未经考古调查、勘探擅自进行建设工程案”办案体会

郑州市文物局

郑州是著名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支持保护的六大遗址片区之一、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全国典型的文物资源大市、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郑州市地处铁路公路航空交通要冲,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十分活跃。郑州历史文化悠久,各类古文化的遗迹分布和埋藏非常丰富。守护住这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化解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是我们不容回避且必须勇于承担的时代命题。

相较而言,有形的建筑类不可移动文物容易得到认知和重视,但是地下埋藏的文化遗迹,尤其是那些未确定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连登记在案的不可移动文物都不是的文化层等文物现象,往往不为社会公众所知。这些文物保护对象往往是文物工作者尤其是文物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的,是需要精心守护的。郑州作为文物密集型城市,全市大量分布这种地下埋藏的文化层,几乎是只要有基本建设就有面临毁灭的风险,亟须我们积极破解这一保护难题,精准查处相应违法行为,为文物事业争得发展存续应有空间,捍卫文物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做好一项工作就要抓好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郑州市文物行政处罚的重点领域就集中在这个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之上。

“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局、文物稽查支队查处河南厚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经考古调查、勘探擅自进行建设工程案”获评2024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十佳案卷,一方面表明文物行政处罚案卷制作水平在多年来的执法实践中因时而变不断修正完善,另一方面,案卷的规范制作也是一线执法人员扎实甄别、研判案情,及时精准惩治文物违法行为的实际记录,通过坚持不懈的文物行政执法工作避免文物的损毁和流失。回望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有以下的感触和认识。

强力打击危害文物安全行为,不断提升文物管理水平

文物保护发展是一个特别需要政府部门主导扶持的重要领域。郑州市文物局一直将文物保护作为工作重点和主要内容。文物保护至少要在两个方面下大功夫。一是要强力打击危害文物的违法和违规行为,重点在于保护文物本身的安全。一个地区和行业的文物工作状况如何,文物安全是重要的考核和衡量标准。这里又有两个方面,保护好既有发现的各级各类文物,同时保护好仍然埋藏在地下尚不为人知的即将通过各种形式出土面世的文物安全。二是坚决维护好文物行政管理秩序。良好的管理秩序是文物事业发展前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好的管理秩序有助于在全社会推崇人人遵纪守法、自觉爱护保护文物的良好氛围,也会促使各级各部门更加重视文物保护,不至于在基本建设等社会活动中将文物保护置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地位,而是主动保护文物,发现文物价值,对文物进行有效活化利用,更好发挥其社会功用。郑州市文物局以文物行政执法工作为重要工作抓手,将文物行政处罚放在重要突出位置,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根据工作布局和形势需要,形成以日常文物安全执法巡查监督为基本依托的查漏补缺缺式的执法模式。

加强层级配合,织密防范之网

郑州市文物行政执法处罚权在市本级,即全市各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由市本级承担,具体做法是将文物安全管理与行政执法紧密结合,合并管理。文物安全管理沿用层层签订文物安全主体责任书的方式,突出乡镇街道办的政府主体责

任,也为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积极参与行政违法行为处置打下基础。与此相应,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各层级密切配合、各司其职。郑州市文物局充分借助省会城市的有利地位,加强与同城的河南省文物局的协作指导关系,同时强化对各区(含开发区)文物局的监督指导。此项“十佳案卷”在办案过程中,取得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指导,与省文物鉴定机构配合,及时有效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锁定主要证据,为案件定性和最终处理打下了关键基础。同时该案件案发地所在区文物局主要领导亲自参与案件调查,包括多次对案件现场的踏勘、文物鉴定的陪同协调、确认违法主体等工作,对在本行政区域出现的文物违法事项不包庇不隐瞒,体现了良好的工作状态。

强化业务技能,夯实文物安全工作基础

郑州市文物局注重强化主体意识和责任,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不断完善文物事业治理结构,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关于本次案件有如下体会:一是领导亲临一线指挥参与办案,掌控案情走向。郑州市文物局领导多次赴案发现场了解案情,作出判断和指示,从政理理论高度为案件把舵定向;办案部门领导积极发扬民主,与办案人员充分探讨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确定办案方向和适用裁量标准。二是执法人员均为从事文物行政执法工作20余年、长期在一线执法办案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与判断能力突出,熟悉文物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是对文物法律的法理概念掌握准确,对正确理解法律和适用法律起到决定性作用。三是熟悉文物业务,郑州市文物局将执法与安全业务融为一体,通过巡查等多种形式,促使一线执法人员熟悉本地文物资源分布及发展状况,将执法工作融入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大环境之中考量。以上几点相互叠加,促进了案件的依法及时准确办理。

创新工作方式,强化执法力度和效能

本次案件办案过程中,郑州市文物局的一线执法人员敢于亮剑,表现在:一是及时叫停违法建设行为。该案从开始介入之初,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建设单位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在建设方的配合下,直至案件调查结束,建设现场一直处在停工状态,为案件的正常办理争取到一个稳定的环境,也尽可能避免了危害行为的进一步发展。二是灵活运用法律条款。涉案违法建设行为既发生在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也存在开工建设前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问题,办案人员可以按以上两个法律禁止性规定进行必要惩治。通过文物鉴定评估,郑州市文物局决定依据后一规定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三是综合运用约谈、信用惩戒措施,促使当事人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全面提升综合办案效果。此外,郑州市文物局长期以来与公安机关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并形成了相应的合作工作机制。借力公安机关,推动联合执法纵深发展,配合公安机关破获了一系列盗掘文物、倒卖经营文物案件,避免了文物损毁流失。

在今后的文物行政执法实践中,郑州市文物局将以此案件为契机,适应时代发展,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执法工作,继续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强化执法力度和执法效能,促进文物执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营造更加良好的文物法治氛围,努力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2024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十佳案卷”纪实



记,并须领取结婚证”第十九条规定“离婚时须向区级以上政府请求,经审查批准,领得离婚证明书,始得离婚”。河北博物院也有一份馆藏的晋冀鲁豫边区时期的“离婚证明书”,格式与这份“结婚证明书”基本相同,但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双方基本信息外,还有家庭状况、离婚原因及离婚条件等重要内容。以上博物馆(院)馆藏的婚姻证明书充分说明晋冀鲁豫边区时期,婚姻登记是缔结和解除婚姻关系的前置程序和公示手段,体现了当时婚姻观念与相关立法的进步。

综上,晋冀鲁豫边区婚姻证明书的真实性比较可靠,除了时间存疑外,其他均符合《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的规定,完整并真实反映了晋冀鲁豫边区结婚与离婚登记制度的实践情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在抗战时期婚姻登记制度与实践的进步。

馆藏边区婚姻证明的历史价值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博物馆的结婚证明书和河北博物院的离婚证明书极具历史价值,能够全面反映革命根据地时期红色区域的婚姻立法与实践状况。陕甘宁特区“婚姻证”体现了抗战前夕边区婚姻登记制度的首次确立与实践情况,晋冀鲁豫边区“结婚证明书”体现了抗战时期婚姻登记制度的进步与现实发展。

同时,婚姻登记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成果体现。陕甘宁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时期的婚姻立法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立法的典范,尤其是晋冀鲁豫边区在承继中央苏区婚姻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等原则的基础上,对结婚、离婚等进行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制度设计,婚姻法律的内容得到了全新的拓展,红色区域的婚姻立法冲击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推进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为后续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